

# “芝罘”地名辨正\*

谈 凯

**提 要：**“芝罘”与“之罘”作地名的使用由来已久。前者是今山东省烟台市核心辖区的名称，后者是出自《史记》的古地名。前者出于后者，并非错字讹误，具有独特的更改目的与使用逻辑。梳理从“之罘”到“芝罘”的地名发展历程，便可明确“芝罘”与“之罘”各自的内涵与使用情况。第一，“芝罘”产生于元明时期，远早于一般认知中的清末民国时期。第二，“芝罘”在晚清烟台开埠前后成为正式名称，所指范围不断扩大，从岛到港、湾，直到成为如今的行政区名称。最后，“芝罘”应作今地名使用，“之罘”则是今芝罘半岛的古地名（历史地名），两者虽均指称芝罘半岛，但对其性质认知也有不同，前者将其视作岛，后者则视之为山。

**关键词：**之罘 芝罘 地名源流 烟台

## 一 问题的提出：“之罘”或“芝罘”？

“芝罘”，在地理名词上，指今山东省北部的芝罘半岛，是我国最大的陆连岛<sup>①</sup>；在政区名称上，指今山东省烟台市最重要的市辖区。溯其源流，“芝罘”脱胎于更早地名——“之罘”。两者并存甚久，明清以降混用甚滥。或因此于此，以往地名研究未将“芝罘”出自“之罘”的具体年代与原因作出辨析，导致“芝罘”产生时间、使用范围、具体含义以及与“之罘”的区别仍模糊不清，“之罘”作为古地名的性质亦晦暗不明。民国时期起，各方所编历史地名辞典，也只载“芝罘”，或仅将“之罘”与“芝罘”并列，不解释源流。<sup>②</sup>

两者混淆通用，不分彼此的情况，造成烟台当代史志与当地政府对本地地名含义、源流看法莫衷一是，甚至只好根据芝罘半岛的形态加以推测。<sup>③</sup>烟台地方史志研究院又有“芝罘”产生于明代一说。<sup>④</sup>此说一来缺少考辨，说服力不足；二来“芝罘”是否产生于明代，亦有待商榷。编过《芝罘区地名志》的芝罘区地名办公室，本应是对这一问题做出最权威解释的机构，

\* 本文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本草纲目》地名研究”（23JDTCA094）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烟台市芝罘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烟台市芝罘区志（1983—2002）》线装书局，2019年，上卷，第131页。

② 民国时人葛绥成编《中外地名辞典》，只存“芝罘”，无“之罘”（葛绥成编：《中外地名辞典》，中华书局，1924年，第225页）。今人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之罘”与“芝罘”并列，言后者为前者别名，未进一步解释（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53页）。

③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官网在“芝罘概况”中言：“‘芝’即灵芝。芝罘岛的形状，恰似一株巨大的灵芝；‘罘’即屏障。芝罘岛横卧在黄海之中，似一道天然屏障，护卫着身后的沃土。”这显然是以今释古，对当地地名源流不加考察，推断而来。这类说法最早发轫自葛绥成《中外地名辞典》。

④ 详见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烟台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官网“芝罘变迁”，2010年11月15日，[https://dsyjy.yantai.gov.cn/art/2010/11/15/art\\_1333\\_378563.html](https://dsyjy.yantai.gov.cn/art/2010/11/15/art_1333_378563.html)，2025年1月20日。

却在论述“芝罘”来源时断言“芝罘，古谓之转附，秦代始称芝罘”<sup>①</sup>。这是不加考证的错误判断：“芝罘”从出现至今，仅有600余年；“之罘”才是自秦代起沿用2000余年的地名。前者延续至今而后者成为古地名，并非简单的“之”作“芝”之误，也不是在一夜之间由“之罘”变为“芝罘”的，而是地名使用在元明以降海运兴起、烟台开埠等一系列历史进程中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大多数有关“芝罘”地名考辨的报刊文章，更是笼统认为“芝罘”最早产生于清末民国，遑论考证两者间的地名发展历程。<sup>②</sup>

为此，以下对“之罘”与“芝罘”的辨正，首先考察两者各自起源与使用情况，进而指出两者明代以降的分野与混用情况，由此厘清“芝罘”的产生目的、取代“之罘”的过程与其所指范围的演变；最后总结两者各自合理的指示范围与使用语境，弥补前人研究之缺，更正各说之误；也期望能对烟台地方史志工作以及烟台地名文化介绍提供参考。

## 二 作为山的古名“之罘”

“之罘”二字，本义已不可考，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腓，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sup>③</sup>

目前而言，见于《史记》的“之罘”，也是最早能确凿指称今芝罘半岛的地名。<sup>④</sup>此后汉武帝巡行齐地，也曾达今芝罘半岛。《汉书·武帝纪》载其事迹，亦曰“之罘”<sup>⑤</sup>。《汉书·地理志》则加有“山”字，曰“之罘山”<sup>⑥</sup>。在元明“芝罘”出现前，历代正史在《地理志》等篇目沿袭《史记》《汉书》，均称“之罘”<sup>⑦</sup>。唐代以降，总志及地方志修纂肇兴，“之罘”作为地名，开始见于方志记载中。迄今仍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唐宋总志，便径引《史记》原文，载“之罘”或“之罘山”<sup>⑧</sup>。因此，可以确认《史记》是“之罘”

① 烟台市芝罘区地名办公室编：《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地名志》，山东省出版总社烟台分社，1989年，第3页。

② 类似报道不胜枚举，如滕长富：《也说“之罘”与“芝罘”》，《烟台日报》2017年8月21日，第10版；哈本厚：《话说芝罘》，《烟台晚报》2024年3月29日，第14版。

③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244页。

④ 清人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怀疑“转附”是与“之罘”同音同指的地名（焦循：《孟子正义》卷4《梁惠王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119—120页）。这一观点被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来括注今芝罘半岛（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但焦氏所论，训诂曲折，多有附会。因此，笔者愚见，在出现更进一步的文献证据（如考古发现）前，不宜将“转附”与“之罘”轻易联系。

⑤ 《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06—207页。

⑥ 《汉书》卷28《地理志》，第1585页。

⑦ 元明以前，历代正史在《地理志》及其他篇目中载“之罘”者，有《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卷28《封禅书》、《汉书》卷6《武帝纪》、卷28《地理志》、《魏书》卷106《地形志》、《隋书》卷30《地理志》、《新唐书》卷38《地理志》，此处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及校勘记。

⑧ 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登州》，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312页；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0《河南道二十·登州》，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409页；王存：《元丰九域志》卷1《京东路·东路》，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3页。

作为地名得载的最早文献。且在元明之前，只“之罘”一称，并无别称。<sup>①</sup>

而自《汉书》开始，“之罘”后又缀以“山”字。那么其所指代的今芝罘半岛是什么情况呢？答案仍见于“之罘”的源头《史记》。除《始皇本纪》外，《史记·封禅书》另载齐地山俗，曰：

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峙”；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sup>②</sup>

尽管自先秦起，便有用“山”指称“岛”的情况，《说文解字》释“岛”字，亦言该字“从山”，但“山”指称“岛”的条件，须是“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sup>③</sup>。可见，自《史记》开始，便不是将“之罘”视作海岛，而是将其视作正常情况下“有石而高”的山：首先，与“之罘”性质相同的其余神山，如“日主”成山、“地主”泰山等，也均非海岛<sup>④</sup>；其次，自《史记》赋予“之罘”山的性质，进而《汉书·地理志》称“之罘山”后，元代之前的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均沿用“之罘山”，无另作“岛”字者，更不言该山处在海中。始皇巡行，径“登之罘”；汉武帝则在“登之罘”之后，才入海航行。<sup>⑤</sup>这足以说明秦汉及以后的古人知悉今芝罘半岛与大陆相连的情况<sup>⑥</sup>，并不把“之罘”作岛看待。

由《史记·封禅书》，也可推知“之罘”出现的大略年代。该篇虽言齐地八神之俗“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即西周初年齐太公吕尚所创。<sup>⑦</sup>但太公初就国时，尚与莱侯“争营丘”。营丘在

① 碑刻文献记载同样符合该情况。如秦之罘刻石有“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之语（《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页）；唐代所存碑刻亦均用“之罘”：如调露元年（679）泉男生墓志铭，刻“碧海之罘，感名山之气象”（王德真、欧阳通：《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并序》，调露元年12月26日，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文德元年（888）新罗朗慧和尚塔碑文，亦有“既达之罘山篆”文（崔致远：《圣住寺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朝鲜金石总览》（上），日韩印刷所，1919年，第75页。碑今存于韩国忠清南道保宁郡圣住寺）。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8页。

③ 《说文解字》第9《山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标点本，第237页。

④ 泰山即今山东省泰安市内泰山。成山即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成山头，其余神山，如琅邪山，在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均位于陆上。鲁西奇在《汉唐时期对海岛的认识》中笼统地将齐地八神山中的之罘、三山、莱山视作海岛，以证明秦汉时期的“山”便是有神性的“岛”。该论颇值商榷。之罘为今芝罘半岛，莱山在今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是正常的山丘而非岛屿。而鲁西奇认为“三山”在海中，但《封禅书》已明言“三山”在“海之南岸”，仍是在陆的“山”，而非是指海中“岛”的“山”（详见鲁西奇：《汉唐时期对海岛的认识》，《思想战线》2024年第5期）。

⑤ 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第207页。

⑥ 今芝罘半岛与大陆相连远在先秦之前，不仅与文献记载相合，也符合地质调查成果。芝罘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因海底抬升、大沽夹河泥沙沉积而形成沙坝，因而合拢。这一过程大概在距今6000年前完成（据对芝罘半岛大疃村西南瀉湖湖底泥沙<sup>14</sup>C测年推测，详见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自然地理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⑦ 参见《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7页。

今临淄一带，与芝罘半岛相隔较远。由此，八神之俗必不出自太公之手。<sup>①</sup>而倘若八神之俗出现在西周以后的春秋以及战国初期，那么为何如“之罘”等山名却未见先秦典籍，直至秦以后才出现？结合八神之俗是先秦齐国的产物，又并非秦代所定，则其产生于始皇东巡稍前的战国晚期，是最合理的。祠山习俗既然形成，相应的山名便可能随之固定，见于典册了。因此，“之罘”的出现，至晚应在战国末年，秦统一之前。

元明“芝罘”出现后，“之罘”并未被完全代替，仍旧长期被官方典志沿用，这在元明以降方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山东地区现存首部方志《齐乘》，以“之罘”为名山<sup>②</sup>；天顺《大明一统志》亦因仍前代地理志，将“之罘”列入名山<sup>③</sup>；嘉靖《山东通志》<sup>④</sup>、嘉靖《青州府志》<sup>⑤</sup>及万历《莱州府志》<sup>⑥</sup>，均沿袭前代地理志或总志，也载“之罘”为山。清代，“之罘”也仍被一统志<sup>⑦</sup>、会典<sup>⑧</sup>作为山川正名载入，甚至在“芝罘”已流传甚广的光绪年间，《增修登州府志》依然将“之罘”作为山名载入。<sup>⑨</sup>从正史及方志记载传承看，两千余年以来，“之罘”这一地名所指代的今芝罘半岛，其整体是被当作山的。

“之罘”作地名指山，在元明“芝罘”出现以前是常态。但在“芝罘”也作指代今芝罘半岛的地名出现后，则会在文献中出现“之罘指山”与“芝罘指岛”的使用区别。

### 三 今名“芝罘”来源与其作岛的性质

上文论及，“芝罘”出现于元明时期，最早所见文献，是洪武三年（1370）内府初刻《元史·食货志》：

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sup>⑩</sup>

《元史》一改之前历代正史均载“之罘”的传统，用“芝罘”。这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是《元史》编修者的错写；第二，元明时期，原本的“之罘”已传有“芝罘”别名。由于《食货志》所载“芝罘”出于海道记述，检视明初留存至今的海运文献，可知《永乐大典》载元代海运路线，也作“芝罘”：

① 参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

② 参见至元《齐乘》卷1《山川》，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第35页。

③ 参见天顺《大明一统志》卷25《山东布政司·登州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413页。

④ 参见嘉靖《山东通志》卷1《图考》，“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地理卷·方志，幅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影印本，第24册，第62页。

⑤ 参见嘉靖《青州府志》卷18《杂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本，第42册，第53页。

⑥ 参见万历《莱州府志》卷首《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第1页。

⑦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73《登州府·山川》，“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26册，第8页。

⑧ 参见嘉庆《大清会典》卷10《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632册，第444页。

⑨ 参见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3《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册，第45页。

⑩ 《元史》卷93《食货志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17页。

夜过黑水洋，望见沿津岛大山，再得东南风，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刘岛。又一日夜，至芝罘岛。<sup>①</sup>

《永乐大典》该条辑录自《元经世大典》。而《元史》各志，其材料也采自《元经世大典》等元代政典。两者文献源头一致。因此，“芝罘”应不出于明初《元史》编者的错写，如果错写，应是元人之误。然而，除《元经世大典》所载航路用“芝罘”，并被《元史》《永乐大典》照录外，元明时期出现的《海道经》亦用“芝罘”，亦被明代方志及海运文献传抄。<sup>②</sup>如此见于来源不同的海运文献一致的更改，应不能用无心之误来解释，更可能是别有用意：“芝罘”得用于元代的两种甚或数种海运文献，或许说明元代在海运航路的书写中，已经普遍弃用“之罘”，转而使用“芝罘”，从而形成“之罘”外用“芝罘”指代今芝罘半岛的书写习惯。

如此判断，首先在于元代以来海运行文逻辑与“之罘”作“芝罘”的现象相合。记叙海运线路，首要目的在于不造成误解，使航行方位正确，且海道需要反复踏勘，由地方层层上报，方能获准起运。这既要求海运文献将原名较复杂的岛屿、口岸名称替换为较易书写的常见字，且要求地名读音保持不变。自元廷兴海运起，这种做法就已出现，如将“岵岵岛”作“木家岛”<sup>③</sup>。明中后期，海运由放洋远岸改为近海而行，海道文献所载地物增多，这种做法日趋普遍，如“模铎岛”作“木极岛”<sup>④</sup>、“荻水口”作“滴水口”<sup>⑤</sup>、“石碯所”作“石臼所”<sup>⑥</sup>等。“之罘”作“芝罘”，符合这种同音异字的更改逻辑。

那么，何以解释其他地名将繁字作简，唯独“之罘”更改，却要更加部首呢？这很可能是因为“之罘”的“之”首先在文言中有“到达”之义，是极常用的动词，同时也作为代词、助词被广泛使用。海道记叙的对地名要求精确，若沿用原名，很可能使人认为此地名为“罘”，不利于理解传抄。这样的更改动机，既符合应用便利、不致误解的海运行文逻辑，又得到元代以降海道记述均用“芝罘”这一现象的佐证。

明中后期，运河屡受黄河影响，或冲决，或淤塞。一时间朝野议论海运蔚然成风。有关海运论著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一现象在地方志中得到较突出的体现：如嘉靖《山东通志》、万历《莱州府志》等地方志设海运专篇，即因循《元经世大典》《海道经》等元代及明初海运文献，照抄故道，用“芝罘”<sup>⑦</sup>，这也使得明中后期的山东方志中，已存在“芝罘”与“之罘”并见于

① 《永乐大典》卷15950《运字·元漕运》，嘉靖内府写本，第7页。

② 关于元明《海道经》的版本及时代问题，学界讨论纷纷。但其最早的底本不会晚于明初，其形成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是没有疑义的（详见章巽：《论〈海道经〉》，《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周运中：《〈海道经〉源流考》，《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此处参考崇祯《太仓州志》所录海道经版本（崇祯《太仓州志》卷9《海道》，广陵书社，2014年影印本，第22页）。

③ 《永乐大典》卷15950《运字·元漕运》，第8页。

④ 梁梦龙：《海运新考》（上）卷上《海道湾泊》，文物出版社，2022年影印本，第62页。

⑤ 梁梦龙：《海运新考》（上）卷上《海道口岸》，第50页。

⑥ 梁梦龙：《海运新考》（上）卷上《海道口岸》，第50页；雍正《山东通志》载海道，遂沿用“石臼”（雍正《山东通志》卷20《海疆志》，乾隆元年（1736）刻本，第13页）。

⑦ 参见嘉靖《山东通志》卷13《漕河·海运》，“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地理卷·方志，第25册，第829页；万历《莱州府志》卷2《海运考》，第133页。

一志的现象。而且,即使记载明代新开海路的文献,也同样因循元代惯例,采用“芝罘”<sup>①</sup>。传抄与因循叠加,便造成“芝罘”已广泛见于明代的海运文献,也使得“芝罘”在传抄、应用中的所指与原名“之罘”产生了明显分野:

作为陆连岛,今芝罘半岛本就兼具“陆”与“岛”的双重性质。上文已叙,自《史记》而延续的“之罘”,是自陆地视角,赋予其“山”的特性。而元明开始应用的“芝罘”,因海运记叙需要,在其后下缀“岛”字,是自海洋视角所赋予的特性。这一区别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泾渭分明:总志、地方志与正史记述山川,则曰“之罘(山)”;而地方志与海运文献记述海道,则曰“芝罘(岛)”。因此,从正、别名的角度看,此时的“之罘”,仍是名山正称,而“芝罘”则仅限于海运文献作“岛”的表达。

#### 四 清代以降两者混用与“芝罘”成为正名

正因海道传抄更为广泛,虽然清代正史、总志及会典等文献仍因循《史记》,用“之罘”。但清中期的山东本地方志也与明代方志一样,既在山川篇目收录“之罘山”,又在海运(海防)篇目收入“芝罘岛”,如康熙《山东通志》<sup>②</sup>、乾隆《莱州府志》<sup>③</sup>、道光《重修蓬莱县志》<sup>④</sup>等均是如此,正、别名并见于一志较明代方志更加普遍;此外,如雍正《山东通志》,已将“芝罘”与“之罘”混用,致使纂者在山川条目中将“芝罘”列作“之罘”的别名<sup>⑤</sup>,不再区分彼此。

“芝罘”在山东本地方志中与“之罘”普遍并存,反映“芝罘”在元代出现后,经广泛传抄,愈发常见。又因其产生、应用于海运文献,得以在清代漕运、海防等关乎经世致用的文献<sup>⑥</sup>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之罘”作为山名,却仍多见于正史、方志的山川条目。因此,自明代为始,延至清中期,“芝罘”的常见、常用程度或已随着文献传抄、互引而超越“之罘”,随着登州府沿海开埠,更具海洋属性的“芝罘”成为正名,其使用频率也因此进一步加大,指代范围也随之扩大。

咸丰十年(1860),英法强压清廷,将开埠地点由登州口改为烟台口。<sup>⑦</sup>次年,《中德通商

① 如梁梦龙、王宗沐在隆庆末年开海运新道,后梁梦龙纂成《海运新考》,王宗沐辑《海运详考》(后又作《海运志》),收录各自有关海运的奏疏,均用“芝罘”。此后,陈全之所撰《蓬窗日记》抄录此道,亦用“芝罘”(陈全之:《蓬窗日记》卷3《世务一》,文物出版社,2023年影印本,第106页)。再如,郑若曾《筹海图编》记述各省海口、海道,用“芝罘”(郑若曾:《筹海图编》卷7《山东事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3页),后茅元仪《武备志》、王在晋《海防纂要》等,均抄录之[王在晋:《海防纂要》卷2,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第15页;茅元仪:《武备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8页]。

② 康熙《山东通志》卷7《山川下》载“芝罘山”;卷16《河防》附海运载“芝罘”(康熙《山东通志》卷7《山川下》、卷16《河防》,“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1册,第125、233、234页)。

③ 乾隆《莱州府志》卷1《山川》、卷13《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4册,第40、287页。

④ 道光《重修蓬莱县志》卷4《武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0册,第56、58页。

⑤ 参见雍正《山东通志》卷6《山川志》,第24页。

⑥ 如《行水金鉴》《海防述略》等,均因循明代海运文献,载入“芝罘”(傅泽洪:《行水金鉴》卷99,雍正三年(1725)刻本,第10页;杜臻:《海防述略·登莱》,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15页),此不枚举。

⑦ 烟台港于咸丰十一年(1861)7月17日开埠通商。英法《天津条约》中,曾有开登州口岸一条,后以烟台更适合开埠,遂以烟台为新商埠所在。

条约》签订,首次以“芝罘”代称烟台商埠:

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等口,大布国暨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和约各国民人家眷等,皆准租建居住,来往贸易,工作平安无碍,船货随时往来,常川不辍……<sup>①</sup>

这样指代,无疑受到当时翻译习惯的影响。英、德文语境下,今烟台山至芝罘半岛的沿海区域通称“Cheefoo”或“Chefoo”<sup>②</sup>,条约中译作“芝罘”而非“之罘”,正反映两者并用多年之结局——“芝罘”成为指代今芝罘半岛的常用称呼。<sup>③</sup>

自《中德通商条约》使用“芝罘”后,在中文语境下,不仅整个烟台港有“芝罘”的别称,烟台港以外的海湾也被称作“芝罘湾”,又有“芝罘村”等聚落组织的名称出现。<sup>④</sup>上海、青岛等城市,也开始以“芝罘”命名市内街道。<sup>⑤</sup>“芝罘”二字作为地名便被更频繁地载入方志、报刊当中,这使得论及现代烟台、福山及今芝罘半岛地区时,几乎只用“芝罘”,“之罘”逐渐成为鲜用的古地名。民国13年(1924)葛绥成编《中外历史地名大辞典》,基本囊括“芝罘”各类含义:

芝罘:①【半岛名】:在山东福山县北三十五里,秦皇汉武所登芝罘即此。东北伸入海中之地嘴,与大地相接处,为沙质地颈。山据嘴之东北头,自西北通东南。长互十五六里,势颇嵯峨,高于海面近千尺。地颈低而小,远望如海中孤岛,其斜迤入海之状,略如灵芝形。

②【海湾名】由芝罘半岛环抱而成,故名。湾水深广,为一不冻长港,烟台商埠在焉。

③【地名】即烟台别名,详烟台条。<sup>⑥</sup>

葛氏释“芝罘”来历,已不言其源于“之罘”,而是据芝罘半岛的形态做判断。对“芝罘”来源解释不清的情况,在民国方志、地名辞典中也时有显现。<sup>⑦</sup>“芝罘”虽已成为烟台别称、芝

① 《中德通商条约》,台湾“外交部”藏电子扫描件。

② 烟台开埠两年后的同治二年(1863),海关总税务司(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印行首册《芝罘港进出口贸易报告(1863)》(*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heefoo*),即称烟台港为“芝罘港”(port of Cheefoo),并在此后沿用。*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heefoo,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Customs*,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册,第393页。

③ 这里需要特别注明,海关总税务司在将“Cheefoo”回译时,往往用“之罘”,首次回译见于光绪八年(1882)的贸易总册,此后一直延续这一做法(《光绪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中国旧海关史料(1959—1948)”第9册)。但在民国方志、国内报刊、官方地图档案等中文语境下,今芝罘半岛与烟台的标注(括注),基本采用“芝罘”。

④ 参见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民国14年(1925)铅印本,第3册,第122—123页。

⑤ 青岛市、上海市均有“芝罘路(芝罘町)”,参见民国《胶澳志》卷6《交通志》,“青岛历代方志集成”,线装书局,2020年影印本,第1卷,第227页;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建置》,民国7年刻本,第10页。

⑥ 葛绥成:《中外地名辞典》,第225页。

⑦ 如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中,解释为因有芝罘村而命名芝罘岛,显然本末倒置(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第3册,第122—123页)。

罘半岛的正名，但却并未成为行政区划名称，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本义仍指自然地物，即芝罘半岛；另一方面是“芝罘”与“烟台”虽可互文，但主要行政机关、外务机构及商埠均在今烟台山一带。因此，民国时期，中央与山东政府主要围绕以“烟台”为名的市级行政区划进行讨论、实践。<sup>①</sup>直至1983年，国务院撤销烟台地区，组建烟台市<sup>②</sup>，“芝罘区”才成为新建烟台市行政区之一，管辖范围包括今芝罘半岛至烟台山一带，与晚清以来烟台商埠的地域范围重合，“芝罘”名副其实地成为当地行政区名称。<sup>③</sup>

### 结语：“之罘”与“芝罘”的使用辨正

综上，“芝罘”产生、发展于元明，在清末民国成为今芝罘半岛及芝罘湾正式名称、烟台商埠的别名，发展过程较为漫长，因而具备多层含义。清中期以降，“芝罘”与“之罘”在方志等文献中混用日频，但“芝罘”逐渐成为正名，其指代范围最终与“烟台”重合，指代烟台山至芝罘半岛的整个商埠区。而原“之罘”却成为古名。新中国成立后，“芝罘”成为今烟台市下的行政区划名称。当今学界及烟台本地史志的解释，多从芝罘半岛“形似灵芝”“状若纺锤”等自然面貌来强解其名，皆不太合理。

为对烟台地方史志表述与文化介绍提供参考，两者关系与使用规范应在最后加以厘清：（1）“芝罘”为今名，作今芝罘半岛、芝罘湾等正式名称的情况，自烟台开埠前后为始；“之罘”为古名，作当地“今名”“正名”的情况自烟台开埠前后为止。（2）“芝罘”源自“之罘”，但并非错用，而是反映地名应用由陆至海两种视角间的变化。（3）两者虽有混用情况，但严格来看，指代情形不同。“芝罘”在不同时期的指代范围有所变化：清中叶以前指今芝罘半岛；烟台开埠后，除指今芝罘半岛外，可指代烟台商埠乃至烟台市的整个开埠地区（芝罘半岛至烟台山），如今则主要指芝罘区这一行政区划。“之罘”作为古名，指代范围变化较小：指今芝罘半岛，且是在陆地视角下，将整座半岛视作山的表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烟台设市几经曲折。民国18年（1929），山东省政府开始筹备在烟台商埠设市，但次年被内政部否决（中华民国内政部：《内政年鉴》，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8页）。抗战胜利后，烟台于民国35年设市（中华民国内政部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11版）》，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3页）。

② 烟台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烟台市志（1978—2002）》（上），烟台市地方史志研究院，2021年，第10页。

③ 今芝罘区的管辖区包括烟台山和芝罘岛及其两者之间的芝罘海湾，与清末开埠时的烟台口岸范围重合。